

责任心、军事化与新名词

——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研究

杨红运^{1,2}

(1.天津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04;

2.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为了增强保甲组织效能、改造国民心理、增强民族自卫力量和培养保甲人员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意识,抗战前江苏省政府实施了乡镇保甲长训练,主要包括密集渗透的精神训练、以纪律控制为核心的军事训练和范围很广的知识训练。这些训练提高了保甲人员的素质,加速了国家政令的传达,促进了乡村社会中民族国家意识的生长,增强了国家对新乡绅阶层的吸纳能力。然而,由于训练标尺过高,政治实践中保甲组织的滥用造成了保甲人员的差役化,由此严重地制约着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成效。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个案研究,有助于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整合乡村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乡村整合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3-0118-14

Responsibility, Militarization and New Terminology: A Study on the Training of Township Chief and Baojia Chief in Jiangsu Province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YANG Hong-yun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aojia organization, reform the national psychology, strengthen the self-defense force and cultivate the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Baojia personnel serving the public, the Jiang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training of Township Chief and Baojia Chief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mainly through intensive penetrating spiritual training, discipline-centered military training and extensive knowledge training. These training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Baojia personnel, speeds up the transmission of state decrees, promotes the growth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rural society, and enhances the state's ability to absorb the new rural gentry. However, due to the high training scale, the abuse of Baojia organization in political practice has resulted in the servitude of Baojia personnel,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Jiangsu Province's Bao Jia training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s training of Township Chief and Baojia Chief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ru-

[收稿日期] 2019-10-14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微时代‘纲要’课教学中‘四个选择’的讲述策略研究”(TJSZZX17-030);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项目

[作者简介] 杨红运(1984-)男,历史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ral integration.

Key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Jiangsu Province; Township Chief and Baojia Chief; training; rural integration.

政党对于现代国家的构建具有特殊的意义,其推动着孤立和分散的中国乡土社会转变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①。能否通过选举、训练、考试和任命等方式吸收一批社会精英围绕在自己周边,是理解“政党何以能”解决乡村整合的核心问题,因此,干部训练是学术界常说常新的一个研究课题,诸多学者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以往学者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干部训练的研究,更多侧重于中国共产党方面,较少讨论国民党方面^②。即使在有限的国民党基层干部训练研究成果中,学者主要关注抗战时期,迄今尚未有专文讨论抗战前国民党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保甲长)训练。抗战前江苏省作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乡镇保甲长训练最能体现国民党政权基层干部训练的力度和意图,为此,本文以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为个案,主要讨论国民党政权训练乡镇保甲长的目标、机制和成效,以为理解国民党政权整合乡村的能力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考视角。

一、抗战前江苏省政府实施乡镇保甲长训练的主要目标

20世纪30年代,民国保甲制度的兴起既与国民党政权“剿共”的战略部署和应对乡村社会危机的现实需要有关,也与蒋介石为维护个人集权统治和社会军事化管理思想有关^③。1932年,国民党政权先在鄂、豫、皖等国共争斗最为激烈的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后向其他地区扩展。1934年,江苏省颁布了《江苏省各县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决定从江北到江南逐步推行保甲制度,并将实施保甲分为筹备、编查、训练和运用四个时期。保甲编查完毕后,江苏省产生了8086名乡镇长、68360名保长和717786名甲长^④。自省政府主席至乡镇保甲长以及社教机关人员很快都卷入到保甲训练的潮流之中,“训练保甲人员的空气几乎弥漫全省,这种大规模的保甲教育,可以说在本省是空前未有的大事业。”^⑤以县长为代表的训练人员“绞尽脑汁,力竭声嘶,出了几身黄汗”^⑥，“虽时当盛暑,汗出如渗,而全所职员仍专心教授,始终如一。”^⑦那么,官方为何要“绞尽脑汁”和“力竭声嘶”地训练乡镇保甲长呢?其原因如下:

第一,从保甲组织自身来说,训练乡镇保甲长是为了增强保甲组织效能。江苏省政府认为,保甲训练是维持保甲组织运转的活力所在,若没有保甲训练,乡镇保甲长不明了保甲编组的意义,民众容易产生观望和懈怠的心理,原本用以安民的工具有会蜕变成扰民的工具,故“各项保甲工作之推进,全视乡镇保甲长对于应尽责任能否切实执行。换言之,即视乡镇保甲长是否明了保甲意义及办理方法,能否忠实为保甲服务也”^⑧，“有组织无训练,其组织等于乌合之众;有训练而不知运用,其训练可谓徒劳无功。欲

①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② 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黄宗华:《论国民党的干部训练政策》,《求索》2010年第2期;化贵军:《理想与实际:抗战时期国民党基层干部的素质培育》,《民国档案》2011年第2期;房列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干部训练探析》,《安徽史学》2013年第5期;冯启宏:《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以中央训练团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5)》,台湾政治大学史学研究所2004年博士论文。

③ 杨红运:《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7期。

④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1936年,第79—84页。

⑤ 黄懋材:《保长受训后的努力途径》,《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20期。

⑥ 沈家琪:《训练乡镇长之回顾》,《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6期。

⑦ 严溥泉:《江阴县保长训练纪要》,《生力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

⑧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1936年,第205页。

求组织健全,非训练不可。”^①民政厅官员邢昉甚至用“布料”和“裁衣”的关系来解释保甲训练的意义,“盖一盘散沙之人员,若不加以训练,则似一块未裁之布料。其结果不能穿在身上,发生衣之功用。政府欲保甲制度推行尽利,必须实施保甲训练。”^②

第二,从改造社会的角度来说,训练乡镇保甲长可以改造国民心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压力使得知识精英不断反思中国国民性问题(如偏狭自私、因循保守和一盘散沙等),故崇尚权威主义的国民党要人蒋介石等强调必须抑制民众“不受训练的举动”,认为“守纪律”和“有组织”是建设一个健全的国家必经之道,国民党应肩负起民众“保姆”和“导师”之重任^③。在官方看来,作为社会军事化管理的工具,保甲组织承担了“今日之正人心之工具”,有助于消除民众“忽视组织”、“怯懦畏葸”、“自私”、“好高骛远”、“敷衍”和“不守规矩”等不良习惯^④。要想对数以千万的民众进行直接训练并非易事,而通过训练乡镇保甲长进而影响民众心理的做法似乎更为可行,乡镇保甲长既是下级干部和社会表率,又是公民训练的直接负责人,可为“改造社会之基本队和先锋队”,受训后可以“改变陈旧腐败的思想”^⑤。无怪乎徐州民教馆馆长赵光涛这样讲道:“如果能与这一批批群众的领袖发生联系,那末就等于抓住了200万的民众。他们可以把教育的力量介绍到200万民众间去,我们直接对乡镇长施教,便是间接对200多万民众施教。”^⑥

第三,从救亡图存的角度来说,训练乡镇保甲长可以增强民族自卫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救亡图存的呼声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保甲训练也不例外。面临“四面楚歌”“列强环视”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当局深信,“只有用保甲组织教育和训练人民,使其具有国家意识和国民责任后,民众才会爱国爱民族,国防才会稳固。”^⑦又如南通区专员郑亦同也强调保甲训练对于抗日御侮的重要性:“譬如九一八及一二八,尤为严重之大国难,窃以为过去我国通病,重在不能合作,物质建设次之,全国不能一德一心,实我国衰弱的致命伤……诸位受训期间,应以之决心努力,平日尤须担负起一乡镇之责,造成一个健全的细胞,一县如此,全国皆然。”^⑧当局相信,惟有通过保甲训练民众,授以其必要的战时军事、医药救护和交通维护等知识和技能,一旦二战爆发,中国便有了无穷的战斗人员可供调遣,最少限度也能自立自卫^⑨。

第四,从地方性的角度来说,训练乡镇保甲长可以培育其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意识。不可否认,国民党恢复保甲制度是国家权力向乡村扩张的重要举措,但这种扩张只有在尊重乡村社会自我表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正因如此,官方也经常强调保甲制度的“地方性”,例如强调“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不得选为保甲长,劝导保甲长“既被推选,即应敬桑梓,克尽厥责,不得冀图个人安逸”^⑩。在训练乡镇保甲长时,官方也使用“团结好人,清除坏人”等民间习惯的表达,以劝导乡镇保甲长应树立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例如余井塘强调乡镇长应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可做“乡愚乡棍”;要充实“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如此才可赶上时代”,“我们做乡镇长是因为我们乡镇里面的人民图谋福利来做乡镇长。看不惯乡镇里面那些无法无天的坏人,我们要做乡镇长来消除他们;看不惯乡镇里面那些天昏黑地的人,我们要做乡镇

① 徐幼川:《保长训练以后》,《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20期。

② 邢昉:《保甲训练之研究》,《江苏保甲》1937年第3卷第1期。

③ 杨红运:《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7期。

④ 许健:《施行保甲教育对于一般人民心理之影响》,《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5期。

⑤ 陈升侨:《训练保甲长之意义及其方法》,《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4期。

⑥ 赵光涛:《训练乡镇长之意义》,《教育新路》1935年第75-76期。

⑦ 《陈主席在民政厅召开保甲谈话会讲词》,《江苏省政府公报》1934年第1739期。

⑧ 《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期间消息汇志》,《民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3期。

⑨ 杨时须:《保甲制度之运用》,《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2期。

⑩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1936年,第66页。

长来纠正他们。”^①关于保长训练,他也用了类似的表达:“保长最重大的责任就是肃清保里面的坏人,把保里面的坏人挤干净了,由你们领导起来,为保内各人努力做好事,使保内个人安居乐业,大家不愁食。”^②

总之,抗战前江苏省政府实施乡镇保甲长训练,既有组织效能的考虑,也有改造社会的考虑;既有民族国家的话语,也不乏传统道德主义的说辞,纷繁的训练目标体现了官方诉诸保甲训练以应对内外危机的迫切性。

二、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相关规定与实施情形

抗战前江苏省编组保甲时,要求保甲人员“做事不可好高骛远”和“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③。那么,江苏省政府又是如何将宏大高远的保甲训练目标付诸实践呢?本部分我们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来讨论:既从纵向的法规变迁来考察保甲训练的趋势,也从横向的精神训练、军事训练和知识训练三个方面来考察保甲训练的具体运作。

(一) 乡镇保甲长训练的趋向:基于保甲训练法规的考察

1934年9月,江苏省颁布了《江苏省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大纲》,规定了训练主管机构、训练科目、训练乡镇保甲长的干部人员和受训乡镇长的旅膳费等。依据该大纲,民政厅颁布了《江苏省各行政督察区乡镇长训练所简则》和《江苏省各县保甲长训练所简则》等。1935年,江苏省在本年度行政计划中强调“办理江南及江都区所属各县乡镇长训练事宜”,“继续办理保甲长训练,其中,训练保长为该年度中心工作”^④。1936年,江苏省将甲长训练列为年度中心工作。1937年,随着乡镇保甲长的改选和整理保甲的进展,江苏省颁布了《江苏省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实施大纲》,强调“乡镇长训练在12月以前完成。乡镇长训练一月后改选之乡镇长,由本所补行训练之”^⑤。依照前后两个保甲训练的大纲,我们可以看出保甲训练的重点和内容有所变化。

第一,训练主管机关的规格有所提高。1934年,江苏省政府关于乡镇长训练机关有这样的规定:“在已设专员之区,由专员负责办理;未设专员之区,由民政厅派员办理。每一行政区,各设训练所一所。”训练所所长由专员或民政厅代表担任。关于保甲长训练,“保甲长之训练由各县县长负责办理。得于各县之区内划分若干训练区,每训练区各设一保甲长训练所,召集各该区之保甲长训练之。”^⑥1937年,省政府规定乡镇长训练统一集中到省会,保长训练分期集中于专员公署所在地区。若有种种困难之区,可以集中于县进行,“省级乡镇长训练所,由民政厅长兼任所长。区设保长训练所,由专员兼任所长,各县县长兼任副所长。”^⑦乡镇长训练所所长由专员改为民政厅厅长兼任,保长训练所的主管人员由县长(或区长)改为专员兼任,足以见到保甲训练在当局心中的分量。

第二,训练时间有所延长。1934年,江苏省规定乡镇保甲长训练期为3周。1937年,江苏省将乡镇长的训练期延长至2月,计划分4期训练完毕;保长训练期为1月,依据人数多寡来施训;甲长训练期与壮丁训练期相同,计划分为5期或6期^⑧。

① 余井塘:《为什么要训练乡镇长》,《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6期。

② 余井塘:《为什么要训练保长》,《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8期。

③ 董浩:《现行保甲制度》,(上海)春明书店,1942年,第125-126页。

④ 《江苏省政府二十四年行政计划》(1935年7月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54-1-899。

⑤ 《江苏省政府二十六年度行政计划》(1937年2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54-1-514。

⑥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1936年,第210-211页。

⑦ 《江苏省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实施大纲》,《江苏省政府公报》1937年第2474期。

⑧ 《江苏省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实施大纲》,《江苏省政府公报》1937年第2474期。

第三,军事训练日益重要。1934年,江苏省规定乡镇保甲长训练的主要科目为党义、保甲须知、公民常识和新生活纲要^①,但对军事训练并无专文规定。直到1935年,民政厅明确提出,乡镇长的训练科目为65小时,军事训练应占18小时^②。1937年,江苏省规定“训练项目分精神训练、知识训练、军事训练三种,以发扬民族意识为精神训练之目标,发展国民经济为知识训练之目标,充实自卫御侮能力为军事训练之目标。”强调“乡镇长受训期满,军事、学术两科成绩经考核及格者,取得壮丁毕业训练同等之证书”^③。不难看出,当局将军事训练置于学术训练的优先地位,反映出军事训练日趋重要。

(二) 乡镇保甲长训练的实施情形

大致来看,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主要内容可分为精神训练、军事训练和知识训练三种。

1. 密集渗透的精神训练

保甲训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保甲人员的责任意识,使其能够切实履行责任。能否激发保甲人员的责任意识,成为保甲训练成败的关键。只有通过精神训练,才能去除保甲人员自私自利的旧习,使其养成忠勇的精神^④。因此,“今后保甲训练应注重保甲精神,以共同的责任为主旨,要亲爱精诚,要团结互助。只有相保、相训、相交、相恤、相救,才能达到卫民、保民、育民、导民之地步。”^⑤大致来看,当局对保甲人员的精神训练可谓密集渗透,其体现如下:

第一,官员训话与个别谈话。开学至毕业,以县长为代表的政府官员要对保甲人员(主要是乡保长)进行集中训话,民政厅长和行政督察专员等也经常出席并致辞。对甲长的训话,主要由县政府派员、区长或乡镇长承担,有时专署和县政府也会派代表参加。政府官员对保甲人员训话的主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官员不厌其烦地强调乡镇保甲长地位之重要,以唤醒其责任心,如余井塘所说:“我们知道一国政治的好坏,不在中央,也不在省,而在地方各乡镇。乡镇政治的好坏取决于乡镇长。”^⑥另一方面,官员也尝试从乡土性的角度来激发保甲人员的责任心,例如在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毕业典礼上,余井塘勉励受训的乡镇长应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能力,热心为南通服务,以发扬张謇先生的事业。杨山县保长训练时,专署代表张大鹏也有类似的说辞,他呼吁保长们“为地方服务,为国家尽力,为铜山区增光”,极大地鼓动了受训保长的热情,“受训保长踊跃。”^⑦

除了集中训话之外,县长等官员也常召集一些保甲人员进行个别谈话,以增强受训效果。一份典型的保甲谈话内容包括询问保甲人员的操行(即“语言、态度、性格、节俭、有无嗜好”),了解掌握保甲人员的“观察力、责任心、服从性、统治能力、进取精神”等^⑧。例如萧县办理保长训练时,县长姚雪怀曾与全体保长轮流谈话,甚至不辞辛苦地于雪夜亲赴学员宿舍巡视^⑨。昆山县保长受训时,县长彭百川召集一些保长进行个别谈话,向其询问地方情形^⑩。南通县保长训练时,训练和教导处每天下午要抽调部分保长进行个别谈话,县长金宗华亲自与70岁以上及边远之处的保长进行谈话,向其询问地方状况,勉励其振作精神,努力为地方服务^⑪。

①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1936年,第210页。

② 《民政厅规定乡镇训练各科应占时数》,《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7期。

③ 《江苏省各县乡镇保甲长训练实施大纲》,《江苏省政府公报》1937年第2474期。

④ 蒋井良:《赣榆县保长训练概况》,《淮海》1935年第2期。

⑤ 《江都县保长训练所开始》,《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20期。

⑥ 余井塘:《为什么要训练乡镇长》,《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6期。

⑦ 《杨山保长训练所开学》,《保甲半月刊》第3期。

⑧ 《吴江县保长训练所开学典礼盛况》,《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4期。

⑨ 许健:《萧县县政调查报告》,1935年,第20页,南京图书馆藏。

⑩ 《昆山训练保甲长经过情形记略》,《江苏保甲》第1卷第9期。

⑪ 金宗华:《一年来之南通保甲》(续),《生力月刊》1935年第1卷第5期。

第二,教材、信条和标语等书面文字的渗透。作为保甲训练的教材,党义和新生活纲要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前者是为了宣传三民主义的理论,后者是为了灌输“礼义廉耻”。如淮阴县孔庙镇的保甲长训练课上,训练人员讲授的要点如下:“1、新生活运动是哪一个人发起的和其主旨。2、什么是新生活运动?3、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4、新生活的规律。5、什么是礼义廉耻?6、礼义廉耻与衣食住行。7、怎样实行新生活?”^①又如宝山县萧泾乡甲长训练时,制定了甲长信条,其中两款为“我要遵守总理遗教爱护党国”和“我要努力推行新生活”^②。萧县要求受训保长们早晚高呼保甲长信条一次,以使保甲人员“精神健旺,饶有朝气”^③。再如昆山县保长训练时,训练所大门张贴了白布对联,上面写着“办理保甲是保障社会安宁充实民众自卫力量”,“训练保长是实施保甲教育养成自治基本人才”。讲堂门口两旁的对联为:“办理保甲可以除暴安良守望相助改良旧社会”,“办理保甲可以兴利除弊推行政令建设新国家。”^④

第三,宣誓、唱国歌等多种仪式的渗透。关于宣誓,溧阳县保甲乡镇长和保长训练即可说明这一点,该县受训乡镇长须宣誓以“恪遵总理遗嘱”和“服从三民主义”为己任,“要奉行上级机关法令,尊重地方人民公意,忠心及努力于本职;如违誓言,愿受最严重之处罚此誓。”^⑤课外活动时,教官要向乡保长灌输“爱护党国旗帜,尊敬总理为党国惟一之领袖”的信条^⑥。阜宁县保长训练时,训练所要求受训人员背总理遗嘱,会唱国歌^⑦。当然,有时官员也会塑造与受训人员“同甘共苦”的氛围,以增强受训效果。例如太仓县保长训练时,正值酷暑天气,县长温崇信率区长等与保长们同住训练所,以示同甘共苦^⑧。高淳县训练保长时,教官与受训人员共同吃住,以训练“团体行动之精神”,县长陈列甫自豪地说:“则保长纵失去了行动自由,食宿皆感不安,亦将心服。400余保长从未发生误会。”^⑨与上述县长相比,吴江县长徐幼川的做法更具生动性,该县保长训练开学典礼时,徐正对保长们训话,这时,天降暴雨,徐与保长们都没有避雨,他趁势夸赞保长们“裸头受雨,精神更加一等”,保长们鼓掌如雷,精神异常饱满^⑩。

2. 以纪律控制为核心的军事训练

在官方看来,作为社会军事化管理的工具,保甲不仅具有“安内”的功能,也有“攘外”的功能。“甲乃训练民众,等于现在的壮丁队。有保无甲,困而不练;编户不编伍,只能安内不能攘外。”^⑪因此,强化保甲人员的军事训练,以实现“一个受到纪律控制的身体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身体”^⑫,自然也成为保甲训练的重点,大致来看,各县军事训练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课堂教学和军事操练是训练保甲人员的重要途径。在课堂教学中,教官会向保甲人员讲授一些军备和武器状况,讲授交通学、防空、防毒学和地形学等常识。多数县还向保甲人员印发了国耻史教材,向其阐述国际形势和民族自卫的重要性,例如淮阴县孔庙镇保甲长训练时,专署一名科长抨击帝国

① 陈升侨:《保甲长训练之实验》,《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期。

② 沈洁卿:《宝山萧泾乡训练甲长经过》,《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3期。

③ 许健:《萧县县政调查报告》,1935年,第20页,南京图书馆藏。

④ 《昆山训练保甲长经过情形记略》,《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9期。

⑤ 《溧阳全县乡镇长举行宣誓就职》,《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9期。

⑥ 《溧阳县保长训练之一般情形》,《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3期。

⑦ 《阜宁县保长训练完毕》,《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4期。

⑧ 黄述真:《昆山太仓两县保长训练之检讨》,《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5期。

⑨ 陈列甫:《高淳县保长训练所开学》,《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22期。

⑩ 《吴江县保长训练所开学典礼盛况》,《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4期。

⑪ 张毅忱:《保甲定义的综合研究》,《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19期。

⑫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9页。

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几无生日”，中国要想挽救危亡，只有加强军训^①。东海县文庙镇甲长训练时，军事教官向学员们讲述了“从华北现状说到甲长应有之觉悟”和“甲长应具有之军事知识”等。^②高淳县保长训练时，适值国耻纪念大会，县长讲述了1931年以来我国的内外遭遇。当时，微雨霏霏，保长们都能保持肃穆。散会后，保长们沿街游行，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夸奖，称此为该县空前之盛举^③。

与课堂教学相比，军操练习似乎更为重要，训练人员希望通过军操练习来增强学员的体魄和自卫能力。仅此方面而言，萧县的保甲训练较有特色，该县要求学员从周一到周五练习“立正姿势及稍息”、“齐步进行”、“跪下及卧倒”、“正步齐步互换”、“行进间跪下及卧倒”、“原地队形方向变换”和“阅兵式”等内容。该县保长训练结束后，民政厅和专署派员进行检阅，检阅人员认为，该县的国术和教练最为显著，“保长们精神饱满，军纪严肃，操法整齐，动作敏捷。”为此，民政厅长余井塘发贺电称：“该县举办全县保长训练为推行保甲以来之创举，于将来训练保甲长和壮丁树立先声，深为欣慰。”^④

第二，强化保甲人员的纪律观念。当局反复强调保甲人员要做到“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认为此为克服自由散漫的必要途径，例如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所制定的教室规则，较为细致地规定了受训人员的位置、动作和姿态：受训人员不得无故缺课或迟到早退，必须按号入座；上课或下课铃响，学员要起立致敬和顺序出入；上课时，学员要保持静肃的态度，不得相互交谈；课间休息时，学员不得喧哗，不得随地吐痰或乱扔纸屑。针对学员违纪行为，教务处和教师要记录在案，依据情节轻重实施惩处^⑤。1935年，南通县保长训练所每个教室设置正副组长各1人，协同教员维持课堂秩序。为了确保行动纪律化，该县依照保长所在的自治区为单位设置了13个领队，以加强对学员课外活动的管理。27人因为缺课5小时以上而被勒令补课8小时，有17名保长因违反课堂规定而被罚站听讲，23名保长因违规而被责令打扫课堂或宿舍。该县声称：在纪律约束下，保长随意缺席的弊端能够得到革除^⑥。

第三，受训学员日常生活军事化。官方认为，加强对于学员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管理是实施保甲教育的重要途径，故常强调“保甲组织要军队化，行动要纪律化”、“管理力求军事化、严格化”、“日常生活要军事化”^⑦等，并依据保甲人数或场所（教室或宿舍）对受训学员进行编排，其层级单位有团、中队、连、排和班。武进县保长训练所的编排较为典型，该县训练所设军训团，所长兼任团长，团副由保安队训练主任担任，2名营长和6名连长由保安队分队长和公安局巡官担任，营连长与学员共同起居。学员的食宿地点被编上号次，起居和吃饭时，教官要点名一次；学员外出时，需要向营连长请假^⑧。除了采取军队编制外，不少县要求学员穿着统一的白色衣服和黑色裤袜，以保持操练的效果，例如扬中县保长训练时，学员们穿着统一的训服，感到了军训的重要性。一次训练中，大雨如注，保长们在泥泞中仍踊跃受训，赢得了民政厅保甲指导员黄懋材和县长洪康燮的夸赞^⑨。

第四，加强对受训学员的日常管理。纪律观念的产生离不开时间控制，“纪律既取决于对空间、也取

① 陈升侨：《保甲长训练之实验》，《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期。

② 彭大铨：《一个甲长训练班的经过及其评价》，《东海民教》1936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③ 《高淳县保长训练所开学》，《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22期。

④ 《余厅长嘉奖受训保长》，《保甲半月刊》1935年第2期；《萧县训练保长始末记》，《保甲半月刊》1935年第2期。

⑤ 《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期间消息汇志》，《民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3期。

⑥ 金宗华：《一年来之南通保甲》（续），《生力月刊》1936年第1卷第5期。

⑦ 《萧县训练保长始末记》，《保甲半月刊》1935年第2期；《溧阳县保长训练之一般情形》，《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3期；《高淳保长训练所开学》，《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8期。

⑧ 侯厚宗：《武进保甲之组织训练与运用》，《江苏民政》1935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⑨ 《扬中县保长训练所开学》，《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8期。

决于对时间的事无巨细的安排。”^①铜山专区乡镇长训练所的学员作息安排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该所要求学员6点起床；6点半，做早操，7点，吃早饭；7点25分至7点50分，升旗仪式及精神谈话；8点至12点，上课；12点5分，午餐；下午1点至4点50分，上课；5点，行落旗礼；6点，晚餐；7点至9点，自修；10点就寝。训练员定时吹军号，学员听到号声后，立即一致行动。外出学员必须事先请假，外宿也得经过训练所批准，用餐和就寝时不得说话。训练主管人员表示：“这种集团化、纪律化的训练，很有效果，比如早晨早操，起先都感到不大舒服，不多几天，也就习惯了。”^②

3. 范围很广的知识训练

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识字程度参差不齐，不过平均识字率还是高于普通民众。据1936年的统计报告显示，乡镇长识字率达到98%，保长识字率为89.23%，甲长识字率为58.29%，然而，近一半乡镇保甲长接受的是私塾教育^③。即使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乡镇长，官方也抱怨他们与时代存在着一定的脱节，“这些做最下层官吏的乡镇长，生活习惯的传统势力，牢牢地束缚着他们，使他们不能跟着国家政治的方向一同前进；目前大多数乡镇长，与10年前，20年前的乡镇长，在生活上，意识上，行动上，没有什么两样。”^④因此，加强对保甲人员的知识训练也是官方重点关注的内容，其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课堂讲授与讨论。在保甲人员受训期间，训练所会聘请党政机关人员、民教馆长和地方士绅为学员们授课。例如1935年8月中央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南汇分区主任胡学文受邀为南汇县第三保长训练所学员做了题为《中国之棉业》的讲座，向学员分发800余册材料，“计听讲保长270余人，均系各乡优秀分子，对于所讲各点，俱极了解，将来回乡，必能广为宣传，竭诚劝导。”^⑤同年，无锡县保长训练时，县政府邀请实业家薛明剑做了题为《保甲长应该要协助发展国民经济，并着重指导副业工作》的讲座^⑥。

与课堂讲授相比，教员们更倾向于鼓励学员参与小组讨论，交流地方情形，以改进地方政治。例如南通区乡镇长训练的讨论提纲为“怎样做一个良好的乡镇长”，学员们要围绕“乡镇长的地位”、“乡镇长的任务”和“良好乡镇长具备的条件”三部分进行讨论^⑦。高淳县受训保长小组讨论会上，学员讨论了苏北水灾募赈问题。随后，学员为苏北受灾地区捐了40元^⑧。类似的讨论有助于提高学员的知识和技能，开阔视野。

第二，保甲实习。为了让学员们学以致用，官方比较重视受训学员的实习。一方面，官方鼓励学员按照保甲编制定期召开保甲会议，例如武进县保长训练时，学员按照保甲进行编排，训练所为一区，名为“大同区”，下设“自由”、“平等”和“博爱”3个乡，5名学员组成一个联保单位，每两天召开一次保甲会议，主要交流实习和学业问题^⑨。另一方面，教员会带领学员到指定地点实习户口异动查报，例如南通县保长训练时，正值秋燥之时，烈日之下，保长们不知懈怠地实习，因此，“考核成绩，错误尚少。”^⑩武进县保长实习后，“尚无错误发现”，“亦无不合之处。”经过实习，学员们产生了不少疑问，主动请教员给予解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8页。

② 赵光涛：《训练乡镇长之意义》，《教育新路》1935年第75-76期。

③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1936年，第212-215页。

④ 赵光涛：《训练乡镇长之意义》，《教育新路》1935年第75-76期。

⑤ 《南汇分区主任在保长训练所讲演》，《全国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通讯》1935年第2期。

⑥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薛明剑文集》（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200页。

⑦ 《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期间消息汇志》，《民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3期。

⑧ 《高淳县保长训练所开学》，《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22期。

⑨ 侯厚宗：《武进保甲之组织训练与运用》，《江苏民政》1935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⑩ 金宗华：《一年来之南通保甲》（续），《生力月刊》1936年第1卷第5期。

答^①。

第三,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来丰富学员们的知识。各县课外活动种类如下:放电影、学术演讲、音乐戏剧、棋社、国术比赛、参观展览、防空演讲、组织自治合作研究会和演说竞赛等^②。铜山专区训练乡镇长时,组织学员参观了徐州本埠电灯厂、面粉厂、党政机关和民教馆,使其了解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形。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时,不仅组织学员参观南通学院、男女师范、模范监狱、大生纱厂和博物院等地,还为学员们播放了“儿童卫生”、“国术表演”、“云之功用”和“棉之生长,棉之制造”等教育电影,教员一边播放一边讲解,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③。

经过精神训练、军事训练和知识训练,学员们思想和行动逐渐趋于官方设定的标准,例如高淳县一位保长受训期间正值母亲去世,仅请了一天的假便赶回所里受训^④。又据武进县长侯厚宗的观察,该县保长训练之初,保长们还心怀畏惧,但经过一段时间,“一些保长还觉得训练期太短,请求延长训练期呢。”为此,侯颇为骄傲地称:“此不能不谓好现象。”^⑤

三、“判若两人”与“前功尽弃”:抗战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成效与问题

1934年底,江苏省铜山地区完成了乡镇长训练,民政厅长余井塘称赞道:“受训后的乡镇长,精神兴奋,思想转变了许多,对保甲有深刻的认识^⑥。另外一名民政厅的官员也认为,受训后的乡镇长“对保甲已有相当的信仰,与受训前相比,可谓判若两人”^⑦。然而,到了1936年底,有官员就对这种受训结果表示担忧,他说:“以为乡镇保甲长受过三星期的训练,智识已足,必致前功尽弃,而又为将来失败之预征。”^⑧为何官方前后会有不同的看法呢?这里,我们尝试从乡村整合的角度来分析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成效。

(一)训练乡镇保甲长,提高了乡镇保甲长的素质,加速了国家各项政令的传达

关于乡镇保甲长训练的成效,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官方的评价。例如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有这样的回忆:“在镇江举办的江南乡镇长训练,相当成功。我去演讲两次,并访问了几十位年长的乡镇长,最长的有七十几岁,他们虽然不能参加军事术科,但仍能上堂听讲。我询问他们对于训练的感想,他们都说自顾年迈,抗敌实际任务,只好付诸儿孙,自己从旁协助便是了。他们对于军事训练都感兴趣,并且了解到训练的意义。”^⑨民政厅保甲指导员黄述真讲道:“以往大多数保长,僻处农村,种种行为,粗鄙异常;譬如衣不扣扣,随地便溺,无礼貌……今经此训练,已悉数矫正。此种可宝贵之国民教育,实为有史以来所仅见。”^⑩一位名叫金郎西的官员也有类似的观察:“经过训练,乡镇长的思想和行动,确能从自由散漫而趋于纪律化。他们对于政府政令及所负之任务,已有相当之认识,治事能力与身心修养均有进步。”^⑪

与上述感性材料相比,一些具体事例或许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保甲人员受训后的效果,例如南通区专

① 侯厚宗:《武进保甲之组织训练与运用》,《江苏民政》1936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② 邢昉:《保甲训练之研究》,《江苏保甲》1937年第3卷第1期。

③ 《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期间消息汇志》,《民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3期。

④ 陈列甫:《高淳县保长训练所开学》,《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22期。

⑤ 侯厚宗:《武进保甲之组织训练与运用》,《江苏民政》1935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⑥ 余井塘:《保甲制度的真谛》,《保甲半月刊》1935年第2期。

⑦ 张立瀛:《实施保甲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方法》,《保甲半月刊》1935年第3期。

⑧ 沈家琪:《如何充实保甲内容》,《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12期。

⑨ 陈果夫:《苏政回忆》,(台北)正中书局,1951年,第93-94页。

⑩ 黄述真:《昆山太仓两县保长训练之检讨》,《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5期。

⑪ 金郎西:《本省乡镇长训练追记》,《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4期。

员郑亦同称,乡镇保甲长受训后“决没有从前将公事塞责在抽屉内的现状”,“南通区以前有两个乡镇长,他们从来不肯出席什么会议,不肯干什么事。但训练之后,每件事情,他们都先出席,很热心的干。”在郑巡视水利工程时,很多督工的乡镇保甲长主动向他打招呼^①。又如阜宁县保长训练时,县长张渊扬面谕第二区四教乡保长汤乃归竭力消灭保内土匪。汤因一时匪多,难以消灭,就先让一名土匪充当眼线,缉捕了几名盗匪,又用以毒攻毒之法击毙了1名劫匪,缉捕了1名劫匪^②。即使对国民党政权持否定态度的后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保甲制的推行,有利于国民党政府对城乡分散居民的控制,给剿匪、征兵、修路、运输带来诸多方便,从而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管理和统治。”^③不难看出,没有数十万受训乡镇保甲长的配合,国家何以能做到“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管理和统治”呢?

(二) 训练乡镇保甲长,有助于民族国家意识在乡村社会中的生长

受中国传统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统治者专制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农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宗族势力和传统礼俗的束缚,具有平均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等倾向^④。他们眼中有家无国,总感到“天高皇帝远”或“帝力于我有何哉”,对于政治抱着“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态度,故20世纪以来的知识精英都在思考如何强化农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抗战前的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便为国家向乡村输入民族国家意识的具体体现。国家不仅通过课堂教学向学员输入“三民主义”、“九一八”、“帝国主义”、“华北自治”、“新生活运动”、“地方自治”和“农业改良”等新词汇,也通过组织学员唱党歌、外出参观及观看电影等来影响他们的心理,还通过军事训练来提高保甲人员的军事技能,这些措施反过来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动员能力,例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一些保甲人员和民众发起了“推行一分运动”、“绝食一天”等活动,积极筹款支援前线士兵^⑤。抗战爆发后,以乡镇保甲长训练为基础的壮丁训练,在协助军队守卫后方和保家卫国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同阶级立场的史料都不否认这一点。据陈果夫的观察,“所经之处,无论桥梁及交通要点,仓库及防空掩护等,都由壮丁守备。经南京到昆山,一路并无驻军,而地方安定如恒。苏州城内,有几天无军队,完全由壮丁协助警察防守。可见这些训练过的壮丁,对抗敌确有很大功用。”^⑥再如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回忆称,“再有一些人就在壮丁训练中,接受了武装知识、抗日思想,因而毁家纾难,身入虎穴,奔赴战场中的也不乏其人。”^⑦

(三) 训练乡镇保甲长,增强了国家对新乡绅阶层的吸纳能力

以往很多学者研究民国乡村政治时,倾向于运用杜赞奇提出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范式来解释民国保甲制度推行后基层政权的土豪劣绅化,即“保护型经纪”逐渐被“赢利型经纪”所取代^⑧。然而,这种趋势的发生因时因地而异,尤其不能简单地运用于那些生态和环境比较稳定的地区(例如战前江苏省)。事实上,因此,“(地方士绅)这种退出并不是简单离开政治舞台,而是在谋求更高职位、更大范围的权力空间。”^⑨以抗战前江苏省而言,很多地方士绅担任了编查委员、乡镇长资格审查委员、乡镇保甲长训练

① 《郑委员在联合纪念周报告》,《江苏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2061期。

② 国润:《介绍一个办匪的保长》,《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12期。

③ 孙宜武:《往事六则》,政协赣榆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赣榆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42页。

④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6-76页。

⑤ 杨红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宣传与乡村整合——以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宣传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⑥ 陈果夫:《苏政回忆》,(台北)正中书局,1951年,第94页。

⑦ 王德山:《抗日战争前夕扬中的壮丁训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扬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扬中文史资料》第6辑,1987年,第67页。

⑧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401页。

⑨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1页。

员和区长等职,积极协助政权推行保甲制度。例如仪征县保长训练时,除了党政要员外,还有本县百余名士绅参加^①。同月,阜宁县保长训练时,县政府邀请地方士绅解雯青、陈仲冕、张芷青、郭继芳和孙铁吴等为主讲^②。

不仅如此,国家也试图通过训练乡镇保甲长来构建乡村权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即“不受训者不得担任保甲长。因事外出的须补上”^③。早在推行保甲前,江苏省已推行区长训练班,扶植一批依靠官方授予行政权力的、受过新式教育的和政治上认同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故农村调查者发现“目前,江苏乡村中主要的政治机构在区公所”,“区长人选……尚称严格,省立区长训练所毕业的居多,县政府出身的亦不在少数,间或有当地的绅士及大地主。”^④抗战前江苏省实施的乡镇保甲长训练,正是官方进一步扩大吸纳新乡绅的尝试,故官方媒体常将受训学员中的文化水平较高者和年长者树为典型,以证明乡镇保甲长被赋予“国家干部”身份的重要性。例如媒体报道了曾参加嘉定县保长训练的大学教授姚明辉,别人问他:“君身为大学教授,岂屑于受此训者乎?”他说:“我所学者,为文学,而保甲制度,未尝研究,仍有受训之必要。”^⑤此外,官方媒体不吝其词地宣传年长保甲人员的受训表现,例如“年老保长20人,扶鸠上课,雍容听讲,精神饱满,生色不少”^⑥、“寒冷的天气,苍鬓白发的老甲长也兴致勃勃来参加。”^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便不难理解费孝通调查过的开弦弓村在保甲推行前后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曾考取前清秀才的陈先生觉得政府工作不合自己口味,辞去了村长职务,并推荐自己的学生周先生接任^⑧。经过上述举措,政府与士绅的关系有所改善,此加速了国家政令的下达,故官方称“政府能得人民之拥护,所谓上下一致,官民合作,此古今为政之常经,而苏省已肇其基矣。”^⑨

(四)保甲训练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保甲运用的制度缺陷,严重地制约了保甲训练的成效

我们先看保甲训练自身的缺陷。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干部训练的学者基本上都强调其训练目标过高,这种倾向同样体现在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之中。如前所述,政府的训练目标涉及保甲运作、改造社会、民族自卫和保甲人员素养等多个方面,并试图通过3周时间将保甲人员塑造成“完人”,显然没有考虑到知识水平并不算高的乡镇保甲长的接受能力。早在保甲训练时期,官方就有一些质疑之声。据邳县保甲督察员袁寿山的观察,由于保甲训练学科过多,多数教材“文不通俗,新名词太多”,受训人员如坠五里雾中,不得要领。与受训前相比,乡镇保甲长的脑子反而紊乱起来,“不知何者为轻,何者为重?”^⑩另外一位名叫华鹤松的官员也承认:对于毫无知识头脑的乡保长来说,保甲训练无异于走马观花,因此,一部分乡保长依然故我,让这些人去办理保甲,无异于“南郭吹竽和人云亦云”^⑪。阜宁县一位名叫龙明的农民还专门作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保甲训练的丑态:“乡保长训练,古今从未见。走进阜宁城,先奔三宫殿。后进小饭馆,弄上一碗面,吃得汗满面。再奔估衣店,长衫身上炫。有钱住旅馆,没钱找亲眷。次日进公园,县长来训话,照着稿子念。教官喊口令,一声向右转,六人三对面。”^⑫

① 《仪征县保长训练筹备经过情形及开学典礼纪略》,《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4期。

② 《阜宁县保长训练经过述要》,《江苏保甲》1936年第1卷第24期。

③ 侯厚宗:《贡献一些有效办法》,《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9期。

④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1页。

⑤ 《嘉定保甲工作散记》,《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8期。

⑥ 《东台保长训练近讯》,《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9期。

⑦ 彭大铨:《一个甲长训练班的经过及其评价》,《东海民教》1936年第1卷第3、4期。

⑧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2页。

⑨ 《苏省两年来政治之检阅》,《江苏月报》1935年第4卷第5、6期合刊。

⑩ 袁寿山:《海属保甲之检讨》,《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15期。

⑪ 华鹤松:《江北保甲宜从整理和异动方面做去》,《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20期。

⑫ 仇学元:《龙大头轶事》,阜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阜宁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72页。

与保甲训练本身相比,国家滥用保甲组织引发的乡镇保甲长差役化和基层行政人员的逆淘汰,则是更为致命的缺陷。由于官方将保甲组织定位为推行政令的“万能的工具”,不断地宣传应“发挥其最大效能”,“保甲之组织健全,所有关于教育、交通、农林、畜牧、卫生、慈善及其他之各种行政,无不可藉以推动,即将来实施征兵制度,亦必以此为基础,善于利用保甲,以推进各项政令,实无往而不利。”^①在实际运作中,官方所谓的“善用”往往变成“滥用”,更关注保甲人员是否具有“服从性”,“对于政府法令是否切实执行”^②。故苏北剿匪、导淮入海、禁烟禁毒、识字教育、赋税征收和植树造林等政令纷至沓来,“乡镇保甲长及壮丁壮妇,大有忙不胜忙,做不胜做之慨。”^③

繁多政令之下,夹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保甲人员往往充当了“出气筒”:一方面,强调保甲人员必须“服从命令”的政府官员常常会惩处稍有拖延的乡镇保甲长,甚至故意敲诈、体罚和侮辱保甲人员,这与官方主张的县长等官员“平日对于乡镇保甲长,亦应待以优礼”^④的论调严重不符。另一方面,百姓对于保甲人员充满了怨气,乡民家里日常零碎的小事都找保甲人员,稍有不满意,即有怨气。“家中被劫一事,往往到甲长家问询。作匪者,为求其证明良善,不能遂愿,仇念即生,詈言即出,以故公正者,对于保甲一职,无敢承充。”^⑤

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多的官员和民众往往将乡镇保甲长视为过去的地保和总甲而非“乡镇领袖”,故担任乡镇保甲长者要么“常常是社会上没有多大地位或是地方领袖以下的人物”,不敢得罪乡绅,也不敢惩处坏人。^⑥要么就是依靠暴力、金钱或甚至跪拜乞怜求选票的“好事之徒”,“(他们)终日奔走无暇,废弃正气,荒芜田园者,如此疯狂,其竞选之激烈,亦可概见也。”^⑦官方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使得乡镇保甲长的人事更替相当频繁,这又大大地冲淡了保甲训练的效果。早在1935年,有人就对办理保甲较有特色的武进县保长训练效果做出一个保守的估计:不出五年,该县已受训的保长便会减少殆尽^⑧。

四、余 论

1935年,南通专区训练乡镇长时,南通县长金宗华勉励乡镇长们,称“此次训练乡镇长,其机会‘特殊’而‘难得’,以往并无此举”^⑨,此无疑代表了官方对乡镇保甲长训练的看法。抗战前江苏省希望通过训练乡镇保甲长将其塑造成符合国家标准的“乡村领袖”,一些保甲人员的确“在观念上亦改变不少,不再像过去的绅董那样了”^⑩,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然而,官方为此却不得不承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不敷甚巨”的经费紧张,“在财力艰窘各县,则罗掘俱穷,一筹莫展。编查工作之进行,几因之而陷于停顿状态。”^⑪另一方面,正直乡镇保甲长的逆淘汰,如受训乡镇保甲长频繁的更替,相当多的乡镇保甲长曲解法令、公报私仇以及贪污敲诈等等,而热心公益的正直者

① 张立瀛:《各县举办保甲经过之困难及其补救办法》,《江苏民政》1935年第1卷第1期。

② 《江苏省民政厅视导员要点》(1936年1月1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51-1-490。

③ 沈家琪:《户口总复查之回忆与感想》,《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10期。

④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保甲总报告》,1936年,第66页。

⑤ 章籍:《关于整理保甲的两种展望》,《江苏保甲》1937年第3卷第8期。

⑥ 《协助推进保甲问题》,《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14期。

⑦ 胡义山:《沛县政府实习总报告书》,1934年,第276-278页,南京图书馆藏。

⑧ 吕公:《乡镇长训练以后》,《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16期。

⑨ 《南通区乡镇长训练期间消息汇志》,《民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3期。

⑩ 《淮阴区乡镇长训练所从第一期到第二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6期。

⑪ 张立瀛:《各县举办保甲经过之困难及其补救办法》,《江苏民政》1935年第1卷第1期。

则愈发孤立,正如一位辞职者说:“我宁愿去做教书先生,当平民百姓,也决不干被人嫌弃的乡长。”^①官方为训练乡镇保甲长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并不成比例,反而出现了“伴随着国家政权深入而出现的赢利型经纪体制的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中的合法地位”^②的现象,即杜赞奇所说的“内卷化”的政权扩张。结合本专题,本文拟在下列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

第一,国家整合乡村的目标不能脱离民众的实际需求。以往学术界关于国民党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研究,或关注政治层面(如制度更替、权力扩张或传统的士绅解体)^③,或关注经济层面(如财税征收、民生艰难和资源匮乏)^④,较少从心理层面讨论国家目标与农民需求之间的关系,即国家目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农民的实际需求。

事实上,国民党政权往往将农民置于被动的消极依赖地位,缺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这就颠倒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自然无法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官民隔膜。即使有意了解农民生存状况的一些官方调查者,下乡则是“马队导前,洋车居中,步兵压后,蜿蜒着,颇有壮气”,与“如入死境,衣衫褴褛,哭丧着脸”的农民格格不入,故农民连称其为“老总”^⑤。如此,官方又怎能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类似的官民隔膜也出现在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由于官方实施保甲制度更为关注的是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也无法触及到信奉“生存至上”的老百姓的内心需求。官员明知老百姓“惟一日三顿之‘糊涂’或烧饼”,却只会抱怨“老百姓又属惰性太深,旧习太重”,“所谓国家、民族、革命、新生活等,他们都不懂得”^⑥。

既然保甲制度(包括训练乡镇保甲长)并不能解决普通民众期待的吃饭问题,民众(包括保甲人员)又怎能领会国家政令的“好意”呢?保甲推行之初,官方就抱怨老百姓“不清楚保甲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许多人们的怀疑误会,甚至纠纷,因此耽误了工作的进行。”^⑦到了1937年,官方仍感慨:“人民不生兴趣,徒感保甲为政府推行政令之工具,于其己身,有损无益,而失却信仰。怨恶之心生矣。有碍保甲发展,实非浅鲜。”^⑧某种意义上讲,保甲推行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官方的“保甲组织检讨史”,于是,民众采取了忧惧、敷衍、控诉、消极怠工和暴力反抗等形式,不断地消解国家带给自己的“负担”,这也印证了“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⑨的经典论断。

第二,基层政治实践应循序渐进,必须考虑人们的接受能力。以往学术界关于国民党整合乡村的讨论,更多关注其整合的主体、过程和成效,较少讨论整合方式与客体之间有何联系。正如学者亨廷顿所言:“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之间取得平衡,必须把两者结合得彼此都不受阻碍。”^⑩换言之,改革者仅靠主观意愿而不考虑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和改革方式,其变革难免会流于形式主义,或使民众的负担加重。即以本研究而言,抗战前陈果夫主政江苏时,试图将江苏省打造成为全国“模范省”,故他主张“进取”、“切实”和“苦干”的工作作风,力主裁汰尸位素餐的官员,选拔“有能力、有

① 鲜月林:《我记忆中的崔凤五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金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湖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78页。

②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

③ 王兆刚:《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安徽史学》2019年第2期。

④ 沈松桥:《从自治到保甲:近代河南地方基层政治的自治演变,1908—193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9年第18期。

⑤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7页。

⑥ 龚心齐、罗志渊:《江苏各县县政参观纪要》,《江苏月报》1935年第4卷第5、6期合刊。

⑦ 《余厅长对于江南各县保甲谈话会训词》,《申报》1934年10月30日。

⑧ 施奎龄:《一年来办理保甲之感想》,《江苏保甲》1937年第1卷第23期。

⑨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⑩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山、聂振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74页。

品行、有气魄”的青年人为县长,并将经常下乡巡视保甲事务的萧县县长姚雪怀树为典型,督促各县县长频繁地下乡督察保甲,故“各区乡镇保甲长,都是奔走流汗,无暇休息”^①。

就保甲推行而言,抗战前江苏省经历了从推崇年长保甲人员(如“年高德劭”)到消极评价群体作用(如“年迈龙钟”)的话语转移,并通过设置保甲人员的年龄上限来实现该群体的年轻化,以配合其“有为”的政治实践^②。这种理念也渗透到保甲训练中,官方不断地将矛头指向“旧社会”和“旧思想”,期待通过短期的保甲教育来刷新政治,建设“新国家”。然而,文盲占绝大多数的、难以糊口的广大乡民“对政府措施已成惊弓之鸟”,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消化诸多“新名词”,反而认为政府“不啻一万恶之魔鬼也”,这让外来调查者感到了“怅然”^③。官方倡导的“苦干”和“进取”理念不得不向其曾批判过的“旧社会”和“旧思想”妥协,可见,穿越“历史的三峡”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

第三,基层政治实践应注意刚性与柔性的结合。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注意到民国时期基层政治实践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例如李怀印在对民国前期获鹿县的研究表明,官方话语和地方观念“在塑造地方合法化进程中,它们同时共存,并互补互动”^④。又如齐小林对中共士兵参军动机的研究也表明:“革命与乡土规则之间呈现出冲突、矛盾、融合的关系。”^⑤同样,本文研究也反证了开展上述研究的必要性。尽管江苏省乡镇保甲长训练的目标庞杂,但官方最为关注的是保甲人员能否做到“遵守纪律,服从命令”。

在政治实践中,官方很少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为保甲人员解决实际困难,无法使其感受到温暖,更无法使其衷心服膺。一旦保甲人员不能如官方所愿,官方就告诫他们不可“藉口辞职而耽误了工作”,“如果到期不能完成,仍然请你们吃苦头”^⑥。下乡视察保甲编查的县长见到“猪粪牛粪,满坑满谷”,就要求村民整顿,并说:“我下次来看,不改革,就处罚。”^⑦面对官员的施压,民众(包括乡镇保甲长)即使会抱怨“真苦也”,但仍“不得不继续努力”。然而,这种仅靠威慑而不依靠“人情攻势”来支配他人的做法,无法适应中国人情化社会中“亲民”与“交心”的逻辑。“在中国人之间‘搞政治’,也只能这样做——照顾群众‘身体化’的需要,才能令他们‘交心’。”^⑧故时人在检讨被官方视为模范县的萧县的县政模式时称,该县“可谓刚性之极端发挥”,“惟其缺点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又得贤者则治,不得其人则更资以为暴。”^⑨缺乏柔性的基层政治运作如何能保持活力呢?更何谈持久呢?

① 侯厚宗:《武进保甲之组织训练与运用》,《江苏民政》1935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② 杨红运:《年龄、权力与国家话语——以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的选任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③ 魏译之:《江苏山西实习调查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7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56872页。

④ [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和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314页。

⑤ 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8页。

⑥ 侯厚宗:《贡献一些有效办法》,《江苏保甲》1935年第1卷第9期。

⑦ 沈家琪:《户口总复查之回忆与感想》,《江苏保甲》1936年第2卷第10期。

⑧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

⑨ 许健:《萧县县政调查报告》,1935年,第136页,南京图书馆藏。